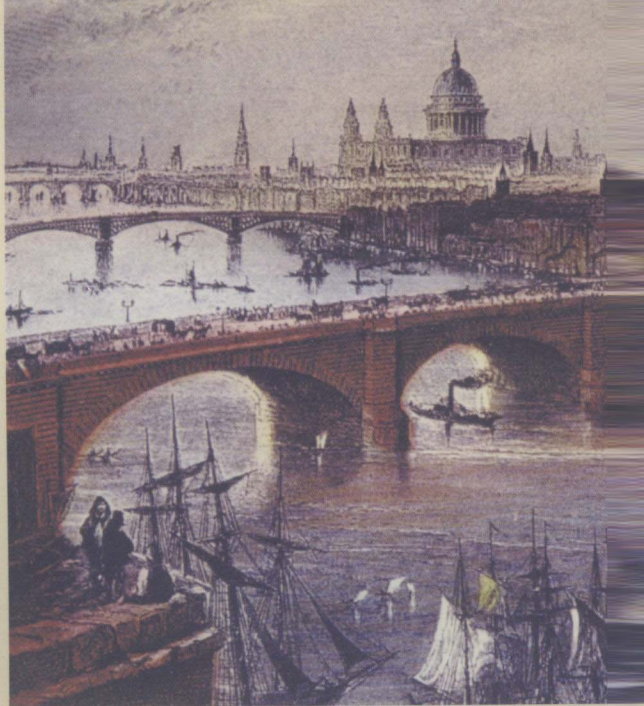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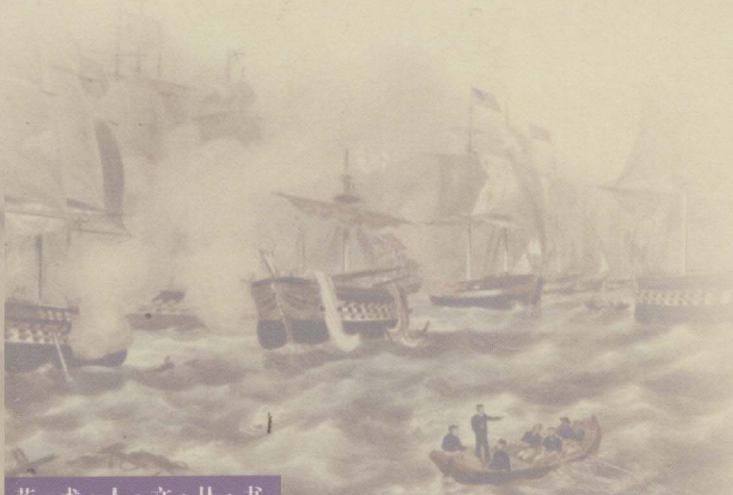




浙江翻译家研究

A Study of Zhejiang Translators

温中兰 贺爱军 于应机等 ◆ 编著



艺·术·人·文·丛·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艺术人文丛书

浙江翻译家研究

A Study of Zhejiang Translators

温中兰 贺爱军 于应机 等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研究翻译家为“经”，以研究催发翻译事业繁荣的经济、社会原因为“纬”，聚焦于唐宋时期、清末民初、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后这几个历史时段中所涌现出来的诸多浙江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和译学观点，探究浙江作为翻译家故乡深刻的历史、经济及地缘原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翻译家研究/温中兰等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艺术人文丛书)

ISBN 978-7-313-06029-7

I. 浙... II. 温... III. 翻译—语言学家—人物研究—浙江省 IV. 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395 号

浙江翻译家研究

A Study of Zhejiang Translators

温中兰 等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1.75 字数:364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30

ISBN 978-7-313-06029-7/K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洪修平

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从而增强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形势下,2006年3月,浙江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在宁波大学成立。中心确立了三个研究方向:浙江海洋经济与管理、浙江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海洋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并且通过跨学科交叉研究,跨单位联合攻关,开展课题研究和学术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倚山傍海,河汉纵横,自古以来对外交流频繁,伴随着频繁的海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翻译活动应运而生,而翻译活动的繁荣推动了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浙江翻译因其历史久、名人多、内容广而在中国翻译史上自成一统,独树一帜。

据史书记载,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就发生在浙江。早在周朝(公元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君子皙举行舟游盛会,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一位懂得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



中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首《越人歌》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译作。

我国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臻于极盛，北宋式微。在这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中，浙江涌现出许多对佛经翻译进行系统总结的著名翻译理论家：释慧皎、释道宣和释赞宁等。他们三人分别编写了《梁高僧传》、《唐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这三本书在内容上相互承接，体例上相互借鉴，形成着独具特色的浙江佛经翻译研究。其中释慧皎著的《梁高僧传》记载了上起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下迄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年）共453年的历史。所载僧人正传257人，附见200余人。此书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本系统的僧传，为研究我国古代佛教史与翻译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它首创的僧传体例，为后者所效法。浙江高僧道宣不仅参与玄奘主持的佛经翻译，担任玄奘译场“润文”的角色，而且编著了《唐高僧传》，对佛经翻译进行系统总结。《唐高僧传》体例仿释慧皎的《梁高僧传》，记述了自梁天监元年（502年）至唐贞观十九年（645年）144年间各大名僧的事迹。全书共分10科，开篇第一科谈论的就是译经。北宋年间的“通慧大师”释赞宁著《大宋高僧传》简称《宋高僧传》，提出了翻译的语言策略：“六例”，并首次把佛经翻译分成三个阶段，介绍了译场的常设编制，对文质之争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对千年译经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

明清科技翻译时期，浙江翻译家同样群星辈出。李之藻、杨廷筠、周子愚不仅译介了西方大量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著作，而且大声呼吁广译西书，为我国科学启蒙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近代，浙江省内更是名家辈出。如蔡元培提出了“政界之译学”的译论、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成为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读物；鲁迅、茅盾引领了浙江左翼“译家军”，不仅在翻译选目上体现出共同的倾向性，而且在翻译方法上也体现出一致性；更有朱生豪、梁实秋矢志译莎，享誉海内外。



当代浙江,翻译名家同样灿若群星,如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集大成者罗新璋、科技翻译的排头兵方梦之、理论与实践并茂的翻译家许钧、译介学的开拓者谢天振、英美文学翻译家宋兆麟等。由于资料欠缺,再加之基于“当代不入史”的说法,这部分翻译家本书基本没有收录。

“浙江翻译家”既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理论概念和专有名词去使用,就应该承认它不是一个学术大杂烩,而是具有某种共同的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那么这些传统应该是什么?浙江翻译名家辈出的原因何在?

秦始皇统一中国,浙江纳入了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但是,浙江大地一直归属于两个以上的地方政府管辖统治,这就使得浙江在历史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亚地域文化系统。明代在浙江设省以后,境内各地方文化在政治权力的整合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类型,同时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稳定性,使得浙江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保持着固有的地方特色。地域社会的离合变迁、“大传统”与“小传统”交互作用催生了灿若群星的浙江翻译家方阵。

1. 深厚的地域文化积淀

浙江省历来就有“文献名邦”、“人文渊薮”的雅号盛誉。隋唐以降,随着大运河南北贯通,我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浙江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大省。浙江的教育事业尤其发达,形成了文教兴盛、人才辈出的优良传统。唐朝以来,浙江不仅官学普及,民间办学也蔚然成风,“仅以书院为例,浙江所建书院数量在全国所占比例,唐、五代居第三位,宋、元、明均居第二位,清代则居全国第一。”^①同时浙江学术活跃,学派迭出,先后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浙江学派有:东汉王允的“实事祭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明朝王阳明心学、刘宗周的蕺山之学和清朝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正是在教育兴盛、学派

^① 吴光. 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C]. 载万斌主编. 浙学研究集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38.



迭出的人文历史背景下,浙江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引领中国翻译事业的翻译名家。从浙江三大高僧系统总结佛经翻译,到李子藻、杨廷筠、李善兰师法西方科技,开启中国文化近代化;从王国维、蔡元培到周氏三兄弟携手共竞译业;无论是呕心沥血、矢志译莎的朱生豪、梁实秋还是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董乐山、李俚民……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聚集了浙江人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2. 频繁的对外交流

浙江的人口流动性很大,温州和台州沿海渔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福建和其他省份,因此在那一带的某个小镇或村落里,可以听到人们同时操闽南话和各种当地方言,一个人可以在顷刻之间说上三四种方言,转换之快,令人诧异。多种语言并存,语言交流频仍培养了当地人民对异质语言的包容能力和适应能力。浙江的海外贸易历来比较发达,在远古时代越人就驾舟筏漂洋过海,东渡扶桑,为日本带去了稻作文化和青铜冶炼技术。及至西汉,浙江人从句章、东瓯、固陵等港口出发,开辟了经福建、广东沿海港口,到达印度支那各地的海上航线。唐朝后期,浙东的明州港(今宁波港)成为对日交流的主要港口。据史书记载,唐朝时期,明州商帮往返于明州与博多(今日本福岡县)间的贸易共有 30 多次^①。此外,明州与东南亚、阿拉伯诸国也有贸易往来。两宋时期,浙江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主要贸易对象集中在东亚的日本、高丽、东南亚的暹罗(今泰国)、婆国(今印尼爪哇岛)等地区。浙江贸易发达促使当地出现了通晓日本等国语言的通译人员。据南宋周辉记载:“顷在泰州,偶倭国有一舟飘泛仔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②元朝浙江是我国江南的佛教中心,日本名僧道中国学佛取经,以浙江各地佛寺为多。

^① 王自亮,钱雪亚. 从乡村工业化到城市化——浙江现代化的过程、特征与动力[M].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6.

^② 周辉. 倭国[G]//清波杂志(卷四). 中华书局,1994:174.



据日本学者官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元朝入浙取经的日本名僧达 59 人,约占全国 1/4 强。同时,应日本邀请,东渡日本传经的浙江名僧也有 10 多人。”^①明永乐年间,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浙江绍兴会稽县人马欢因善于翻译“番语”(阿拉伯文)被朝廷任命为“通译”(翻译官)随郑和出使西洋。

3. 发达的留学教育和教会教育

晚清时期,浙江人开始走出国门到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留学。1872 年,在清政府选派的赴美留学生中,浙江共有 8 人。甲午战争后,浙江地方政府选派留学生的活动正式开始。从甲午战争到 1903 年底浙江在日留学生达到 153 人^②。辛亥革命前后,浙江的留学浪潮进一步高涨,留学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欧美等国家。1908~1911 年浙江共选派留美学生 29 人,而到 1904 年时,浙江赴日留学生达到 191 人^③。在频繁的对外交流与贸易中,语言的沟通与翻译应是题中应有之义。浙江的对外贸易频繁,势必造就出众多的翻译家。同时,各大译馆,设在上海,成为翻译人才的摇篮;而浙江毗邻上海,两地人缘相亲,习俗相近,方言相通,好多浙江人跑到上海译馆工作,这也是浙江翻译家众多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近代浙江教会教育繁荣也是当地翻译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之一。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势力蜂拥而至。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当年,英国妇女蔼尔德赛(Miss Aldersey)奉伦敦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创办了浙江第一所洋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宁波女塾。随后,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D. B. McCartee)也在宁波创办了浙江第一所男子洋学堂——崇信义塾。接着,美国基督教浸礼会、英国基督教圣公会、英国基督教循道会、法国天主教会等也相继到宁波开办学堂。到 1917 年,各国教会在浙江

① 桂西鹏,楼毅生. 浙江通史·元代卷(第 6 卷)[M].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349.

② 转引自汪林茂. 浙江通史·清代卷(第 10 卷)[M].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253-261.

③ 转引自汪林茂. 浙江通史·清代卷(第 10 卷)[M].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253-261.



共创办各类教会学校达 128 所,教师 466 人(其中外国教师 103 人),学生 5188 人^①。在各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中,都把该国语言列为必修课。西方国家的教会在中国办学,无疑是为了对中国人实施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但是客观上为浙江创造了翻译人才辈出的基础条件。

纵览全国的翻译事业,可以看出浙江的翻译家真可谓洋洋大观,名家辈出。然而,有关浙江翻译家的生平事迹、翻译实践、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等,却散落在翻译史书之中,既不系统又不能突出浙江作为一文化大省的特点,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申报了 2006 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省社科规划课题“西学东渐对近代浙江的影响——浙江翻译家研究篇”(编号:06JDHY001-6YB)课题,并获得立项。本书就是该课题的研究成果。

在课题“西学东渐对近代浙江的影响——浙江翻译家研究篇”的研究和编著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范谊教授(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段汉武教授(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和庞继贤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忱。另外,我们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并借鉴了不少作者的思想观点。也正因为如此,《浙江翻译家研究》才有了更高的可读性和更强的学术性及应用性,我们在此表示由衷的感激和谢意。

另外,我们特别感谢上海大学的方梦之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吕俊教授和苏州大学的方华文教授对课题研究和本书编写所做的工作,作为译界前辈,他们不遗余力、奖掖后学、激扬先进,晚辈小生谨致敬谢!

由于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书中有殊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与斧正,以便我们及时修改与订正。

编者

^① 转引自汪林茂,《浙江通史·清代卷(第 10 卷)》[M].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253-261.



序言一

近些年来,随着翻译学科的不断发 展,对翻译家的个案研究持续升温,一扫 20 世纪这方面冷清的局面。研究鲁迅、胡适、傅雷、林语堂、梁实秋、王佐良、张谷若、许渊冲等译家的一批专著陆续问世。作者们挖掘史料,梳理纷争,总结论主的译事经验、分析论主的翻译思想,探寻他们的译路足迹和理路脉络,以当代译学理论阐述他们的理论主张,为翻译批评和翻译史的研究画下了浓彩重墨。但是,在这项研究中,就译家的群体研究和地域特色似见不足。我国幅员广阔,地域特色和人文资源各不相同,翻译事业的兴起、演变和发展各地区很不平衡,且各有特点。为了充分了解一方译家的共同的社会境遇和时代背景,了解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在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集中研究某一地区翻译家的翻译行为和译事贡献是必要的。借此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国翻译史,发展中国翻译史。在这方面,目前仅见林本椿编的《福建翻译家研究》和陈秀编的《浙江省译家研究》两本。而这部《浙江翻译家研究》是一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力作。作者采用全景式的写法,从古到今,顺流而下;同时,又在翻译史的几个横断面上对几个重要时期的重点人物予以高度关注,写法上颇见力度。

“本书以研究翻译家为‘经’,以研究催发翻译事业繁荣的经济、社会原因为‘纬’,聚焦于唐宋时期,清末民初、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后这几个历史时段中涌现出来的 20 多位浙江籍译家的翻译活动和译学观点。”(见绪论)本书按照翻译史上的常用分期原则,描写我国自古至今四个不同时期的浙籍译家的生平事迹,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中评论其代表性译作。值得一



提的是,本书在挖掘并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把 20 多位浙籍译家的翻译活动及其翻译思想点画得栩栩如生、通透可见。

前人的翻译思想有的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之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类研究并不容易。在我国翻译史上,像鲁迅、茅盾那样自觉的、有系统的翻译论述并不多见,有的只是在谏书、奏文中提及,有的在序、跋中略陈己见,有的在书信中袒露心迹,有的甚至不落笔墨。当然,掌握材料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提炼、分析和研究,用现代译论的元素来激活前人的思想亮点。本书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我国传统译论受古代文论的影响,从文本出发,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全方位契合。传统译论以经验为基础,以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为主线,由经验之谈逐渐走向理性的思考。传统译论与当代译论相结合,推陈出新,可以引发新的译理。这也是我们翻译史研究者今后要进一步研究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倚山傍海,河汉纵横,自古以来对外交流频繁,养育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在我国翻译史上,让浙江熠熠生辉的至少还有三个“最”字:

一是有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早在周朝(公元前 528 年)时候,楚国令尹鄂君子皙举行舟游盛会,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一位懂得楚语的越人给子皙做了翻译。这比汉朝有规模的佛经翻译要早数百年。

二是历史上浙江翻译名人最多,尤其在近现代,就各类词典和传略的粗略统计,约占 1/5。

三是翻译内容涉及的领域最广。在佛经翻译时期,释慧皎、释道宣、释赞宁等对佛经深有研究并对翻译作系统总结。西学东渐时期,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开科技翻译之先河。到了近代,更是名家辈出。蔡元培提出“政界之译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鲁迅、茅盾等实践及理论并重,梁实秋、朱生豪的莎译饮誉海内外……

我的童年在浙江度过,求学在上海;青年时期北上闯荡,中年返沪;人

到老年，乡情依旧。脑海中时时浮现家乡的山山水水，白墙黑瓦。依稀记起儿时，在溪边戏水，在田间奔逐。近日，贺爱军博士发来了《浙江翻译家研究》的样稿，读来清新流畅、亲切可人，加上浙人的自豪和情怀，更添序之乐。

方梦之





序言二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开启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它以人的理性之思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提升了人们生活的质量。但是这种理性思潮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的生存带来危机,因为这种科学理性排斥了人的价值与意义。它使主体与客体置于分隔与对立的状态,并在客观性追求的同时压抑和排斥主体性,把寻求事物客观规律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而忘记了科学发展乃是为了人的问题,脱离了生活世界的这一背景。20 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的杀戮,生灵涂炭,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弗兰肯斯坦效应。20 世纪后半叶生态环境的恶化,能源的危机都已成为人类发展中最大的障碍。这一切又一次不得不让人们反思科学理性的功与过的问题。人们终于觉悟到人不仅是“思之在”,同时也是“非思之在”,而“非思之在”是“思之在”之前的那种意义上的存在,即人的生存问题。人们追求科学真理,发展科学事业,改良技术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人类更好生存。但是在科学理性统治下的研究活动中,客观规律性成了最高目标,它置换了人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目的。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看到了科学理性的局限,并开始用历史思维来为它解蔽。历史思维的方式是以人的未来作为目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它不同于科学思维那种向后的逆向式的思维,以寻找事物本源性与本真性为目的,历史思维是前瞻式的,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历史”不就是研究过去的吗?但是研究过去正是为了未来,历史研究的发微索隐是为了钩沉致远,而不是为了发古人之幽思或讲一讲历史故事,它始终是以人的存在与人类发展为思考



对象的。了解历史与现状是为了对未来的筹划,这是历史思维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思维与科学思维的根本区别,前者是始终围绕着人的,而后者却是排斥人的。现在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在发生着生存论转向,翻译学也自然不能例外。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的研究中,历史研究是不受重视的,因为这种范式的特点是共时性的研究,热衷于不同语言对应性规律的研究,认为只要这一问题解决了,翻译的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正是科学主义思想对人文社会科学殖民化的表现。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翻译学,历史研究是它的学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共同构成翻译学的整体框架。翻译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且现在更有深入发展的趋势,这是十分可喜的。将其作为历史研究又分为两个相互关联又有不同侧重的方面,一方面是历史研究,主要在史料的挖掘与梳理方面;另一方面是对史料的分析与研究,并提出合理的解释,即为史学部分。在这两方面当中,史料的发掘当然是基础的一步。没有充分的史料作为基础,第二步是无法进行的。但这两者却又无法截然分开,两者相互渗透,史料之中有事又有人。就翻译而言,许多参与翻译活动的人中有不少是有着鲜明个性和思想深度的人,甚至就是哲学家、思想家或文学家,他们从事翻译活动绝不是把翻译作为一种消遣,而是他们表达自己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他们主业的延伸和拓展。翻译界只把严复看做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显赫头衔肯定是启蒙思想家,翻译介绍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改造腐朽落后的封建中国是他启蒙活动的手段。所以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不认识到严复的思想,也就无法知道他选择那些作品进行翻译的真正动机,而只是从字词句章上去看他的译作,也不会深刻理解他如此推崇“雅”字的道理。所以,研究翻译史,探讨翻译家的思想,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状况、他们的思想形成结合起来会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上的翻译活动。

中国的翻译活动在历史上有三次大的高潮。最早的是佛经的翻译,那次高潮使源于印度的佛学传入中国,并在这块土地上生根,成为我国传统



思想的一部分。它与我国固有的儒学共同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第二次就是“五四”运动前后即清末民初时期的西方学术思想的大规模进入,这就是西学东渐的开始。戊戌变法的夭折,甲午中日海战的惨败,让国人认识到,仅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种皮毛式的方式向西方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学习,学习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传统以及文化,这就是那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新形势又迎来了第三次高潮。在这一阶段中,翻译研究不仅表现在理论上,同时在翻译批评与翻译史的研究上也更全面和深入地展开。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选择“西学东渐对近代浙江的影响研究”的课题,这无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当今发展和未来前景的课题。其子课题“浙江翻译家研究”自然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之前以某地域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家的史学研究尚不多见,这也是这批年轻学者的一次大胆尝试。因为从某地域角度谈翻译家会受到很大局限,这种局限不是来自数量上的(如所研究的对象相对少些),而是来自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这些译家无论出生何地,或在哪里从事翻译活动,他们的影响却是整个社会的或一个时代的。如果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不能与地缘因素很好联结,那么就会与其他这类的研究没有什么区别了。我想这可能会是对他们的一个挑战。乐于接受挑战是年轻一代学者的优秀品质,我相信他们会在这一个新的视角下开创出一条道路来,这本身也是对译史研究的一个贡献。希望他们能够开拓创新,胜利完成这一任务。是为序。

吕俊



序言三

学者们谈到翻译理论研究,总要发一番苦涩的感叹:“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谁说不是呢?自20世纪之初,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便颇具规模,出现了“阐释学派”、“解构主义流派”、“文艺学派”、“释意理论派”和“语言学派”等翻译流派。其中英才辈出,如雅可布逊、纽马克、奈达、威尔斯、施莱尔马赫、斯坦纳以及威尔等,灼然光芒万丈。我国也有很多翻译理论人才,卓越者如刘宓庆、吕俊、王宏印、马祖毅一班大师,然与西方却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若论翻译实践,哪个国家也无法与中国相媲美。自打近两千年前翻译佛经始,中国人对翻译便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参加人数众多,比较著名的古代翻译家有竺法兰、安世高、支娄迦谶、帛延、支谦、康僧会、鸠摩罗什、竺发护、僧伽提婆、昙无讖、真谛、朱士行、法显、玄奘等数百人。到了近现代,中国的翻译家更是群星灿烂,数也数不清,而且每颗星星都发出耀眼的光芒。你说林纾不杰出吗?他的翻译成就哪个西方人能比得上?屈指一数,他的翻译作品竟达245种之多,其中大多为长篇小说。按现在人的观点,能上吉尼斯世界大全了。林译小说运笔如神,把书中的人物译得极为丰满,读了心里充满荡气回肠的英雄情,或者涌起缠绵悱恻的浪漫意趣。《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区区两本翻译小说竟然产生了“醒世”的作用,把一代中国人的魂魄从迷离的状态救了出来。还有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对当时的中国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正是从《天演论》中获得教育,燃起了爱国的热情,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严复不仅翻译了几部影响中国社会的伟大著作,还提出了“信达雅”三字翻译准则,百年来受翻译家们顶礼膜拜。有人说中国的翻译质量



比西方的高,就是因为我们有“信达雅”作为约束以及努力的目标。姑且不论此语是否有夸张的嫌疑,反正现在的中国人执笔翻译,总觉得“信达雅”像紧箍咒罩在头上,不敢恣意妄为,译文也就像模像样了。在中国,这样的“星星”数不胜数。徐寿、周桂笙、伍光健、包天笑、周瘦鹃、马君武、苏曼殊、瞿秋白、郭沫若等,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诺贝尔奖中有“翻译”奖项,肯定会有中国人站在领奖台上。把他们干的事业综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极为波澜壮阔的图画。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想起他们的业绩便心潮澎湃。在一种无比雄壮的感情驱动下,我写出了60余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那可是一口气“呵”出来的,因为我胸中涌动的激情不允许我耽误片刻。可付梓之后,心里总觉歉然:书中虽收入一两百名翻译名家,却仍有许多对中国翻译事业贡献卓著者被漏掉了。过也,罪也!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良心账,觉得最对不起的是浙江的翻译家。李善兰、陈望道、朱自清、裘柱常、吴景荣、叶水夫、王道乾和草婴这样的翻译名家都被我“无情”地忽视掉了!他们可是浙江青山绿水养育出来的俊才,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功不可没!没有他们,我们的翻译“方阵”便缺了排头兵。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我把心里的歉疚告诉了贺爱军博士。他即刻立下了豪言壮语,说要专门为浙江翻译家立传,这就是他们编著《浙江翻译家研究》的初衷。这位从鄂尔多斯草原走来的汉子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有一种气吞山河的气概,我对他的决心和能力毫不怀疑,只是觉得浙江翻译家太多,恐怕他单枪匹马难以胜任。我开玩笑地说:“你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可能数过星星。现在数的则是翻译界的明星,而且更难数哩,因为你必须把每颗星星的亮度描绘出来。”贺博士把胸膛擂得邦邦响,表现出壮士不成功业誓不罢休的气势。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的著作。人们常常用流汗形容努力的程度,他们流的汗水不知湿透了几身衣衫。他们的功力自不待言——贺博士常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佳作不说,还连篇累牍在海外撰写足以让中国翻译界扬眉吐气的文章,出版的译著也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浙江翻译界有着如山高似海深的感情——这一部《浙江翻译家研究》